

劳动与礼俗：女性主导下的上海社会关系建构——以“产业调查”和“奉贤调查”为例

张 文明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上海作为我国目前最发达地区，其社会结构中男女性别关系问题一直以来有各种民间的讨论，但是从学术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比较少见。本文试图从社会关系建构的视角对上海社会结构中女性地位的形成和特征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上海地区由于较早的以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和传统礼俗中的强势姻亲关系促使了女性地位的改变，并使女性在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本研究运用实证研究的资料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述，使用的资料主要有：(1)《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满铁上海事务所：上海满铁调查资料 33 编，1939 年)；(2)《上海郊区农村“空洞化”状况调查研究——奉贤调查》(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项目，2010 年)

上海从开埠以来一直是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工商口岸城市，其在贸易与工商业发展过程中纺织业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产业形式，这种产业形式的发展使该区域的女性较早地从传统稻作农业中解放出来，开始进入到以棉作为主的商品经济型产业领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逐渐改变，甚至成为家庭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主导。产业调查显示，在上海农村，由于女性劳动形态的转变，“与华北、华中、华南不同，女性在家庭和村落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这一现象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正在日益成为乡村社会礼俗的一部分得以展现，在针对上海的调查中显示“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婚姻、生育、葬礼等日常礼俗的执行过程中，姻亲关系一直成为主导一个家庭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女性家庭成员一方的社会关系在日常生活礼俗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家庭和社会关键建构中的重要纽带”。而这种姻亲关系的在日常礼俗中的影响力，在 1939 年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

以下是基于两个调查获得的一些资料。

一、在『中支における農村社会事情——中支嘉定区石岡門鎮附近部落調査の一部落』中，对该地区农村做了如下的描述：

1、该区域的总体状况：长江（扬子江）流域棉花种植为主；接近上海外出打工者较多；土地种植结构精细化，无法依靠农业生活，需依靠家庭手工工业的副业维持生活。

2、女性的地位：没有亚洲家长式的特征，比较自由的个体主义空气浓厚，女性地位很高。得出这一结论的直接依据是：在整个的访问调查中，回答调查员的主要以女性为主，家中有男性户主的家庭，即使男性户主在家中，回答问题也以女性家庭成员为主，而男性户主往往在场而不回答任何问题。调查中列举了具体现象：男性往往在旁边倾听，而由女性家庭成员回答相关调查问题。

基于此，该调查中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这里种植棉花比种植水稻更有意义，同时蔬菜瓜果类成为通过上海市场获得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男子和农业经验・熟练劳动无法成为主要需求。

第二，因为男人外出（到上海）劳动，家庭内部的支配权主要依托女性，农业劳动也以女性亲自劳动为主。他们不会依靠外出劳动所得进行生活（自及自足，张文明），所以女性地位高。

第三，家庭的副业劳动异常发达，这些副业主要依托女性及未成年人实施。这里的竹编及毛巾制造都由女性手工完成。女性位置家庭的能力较强。

另外，调查也从其他四个方面列举了女性的地位：

第一，土地继承：分家过程中，女儿能得到相应的土地和家产——原因：女性家庭成员有贡献可以获得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这在其他地方的调查中没有发现。

第二，家族会议及家族内经济关系：在家庭会议上，按照母亲的兄弟、父亲姐妹的丈夫、父亲兄弟、邻居的有地位的人排列座次。通过母亲兄弟排名居主导地位的现象来看，女性一方的地位高。家庭内部的生活消费（包括衣、食、住）以女性为主导，这主要是因为女性从事的纺织和印染工作是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是维持家

庭基本生活的重要保证。

第三，教育情况：这里有私立学校，而学校的教师有男女教师各两名。当时学校的提出的教育口号“教育是我们大众生来就有的权利，我们要尽量享受”，较早的提出了女性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第四，从婚丧嫁娶的情况看，在以张家为例的一项调查中，女性一方的随礼行为得以详细记录，即，女性一方成为张家随礼行为的主体。（具体参照下图）

年次	（張年齡）	事件	入費
三二年前	（一五歲）	父死亡	一〇〇元
二九	（一八歲）	長姉結婚	〃
二八	（一九歲）	次姉結婚	〃
二四	（二三歲）	張結婚	三〇〇元
二三	（二四歲）	兄嫁死亡	一〇〇元
一九	（二八歲）	兄再婚	二〇〇元
〃	（二八歲）	母死亡	一五〇元
一八	（二九歲）	張再婚	一〇〇元
〃	（二九歲）	張再婚	二〇〇元

右ノ諸事情ヲ見ルト殆ト冠婚葬祭ニ依ル入費テアル。而三五歳ノ時兄ヨリ分家シタカ前述ノ如ク其ノ時曾ツテノハ總テ出典地（事實上ノ小作地）ト化シテ居タ。即チ之農村内ニ於ケル家族の或ハ社會的生活上逃ラレナイ必需界のナ單純再生産ヲ繰返シテキル過小農的自作農ニハ堪

二、基于以上调查，在《上海郊区农村“空洞化”状况调查研究——奉贤调查》（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项目，2010年）的调查中，我们对上海郊区的奉贤区一户家庭的随礼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认为，女性主导的姻亲关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居于主导地位。

目前，N村全村地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800亩，常住户籍人口6200多人，2100多户，划分为33个村民小组，有村属企业40余家，工业用地面积扩大，大量村民从田地走向厂房车间。N村境内有奉浦大桥、沪杭公路、莘奉金高速公路穿过，大桥和公路建设征用一部分农民的土地。《上海农村空洞化状况调查》项目统计数据显示，在N村，约32%的村民家庭没有土地，超过58%的村民只有很少的几分地。农民的土地拥有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民的职业构成、经济收入结构。在土地实现流转或被征用以后，一部分村民转向工厂，职业发生变化，工资收入逐渐取代农业收入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村民的社会交往结构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同事以及由同事关系发展而来的朋友关系逐渐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交往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以王姓村民WWH〔假名〕家的三份礼单为切入点，具体把握一个村民家庭的人情关系网络与不同场合中的随礼状况。

在分析王家的礼单之前，有必要对王家的基本经济状况、家族关系做简单介绍。户主王WWH，男，56岁，原N村八组村民，是XD镇机电厂的电器工人，每月工资2600元；妻子C，陈，55岁，在XD镇做钟点工，每月工资960元；独女，30岁，已婚，嫁在XD镇。W与妻子C现居住在西闸公路以北的两室一厅商品房里，N村王家宅基地上还有一栋两层的楼房，由W的母亲独居。从经济收入和居住状况来看，王家在N村属于中等水平。

以下将参照王家的家族关系具体分析王家的三份礼单：2001 年独女婚礼礼单、2002 年独女生育礼礼单、2003 年 W 父亲丧礼礼单。

1、婚礼礼单

表 1 2001 年王家独女婚礼随礼状况

亲属与关系	随礼人数	礼金金额	百分比 (%)
姻亲关系	15	6340	49.84
师徒关系	4	3000	23.58
朋友	2	1400	11.01
同事	1	200	1.57
邻居、同姓	5	820	6.45
母方亲属	6	960	7.55
合计	33	12720	100

注：表格中的亲属关系范畴均以王家男性户主 WWH 为基础。关于礼单中的“随礼人数”，指代参与婚礼并随礼的家庭数或户数，实际参加婚礼的人数远多于“随礼人数”。文中的其他表格同此。

2、生育礼礼单

表 2 2002 年王家独女生育礼参与者状况

亲属与关系	随礼人数	礼金金额	百分比 (%)
姻亲关系	9	5780	45.51
师徒关系	4	2520	19.85
朋友	2	1400	11.02
同学、同事	5	2120	16.69
其他亲属	2	880	6.93
合计	22	12700	100

注：表格中除“同学、同事”之外的其他关系范畴均以户主 WWH 为基础。此处的“同学、同事”关系主要既包括生育礼当事人——王家独女的同学与同事，也包括户主 W 的同事。

3、丧礼礼单

表 3-3 2003 年王家父亲去世丧礼参与者状况

亲属与关系	随礼人数	礼金金额	百分比 (%)
姻亲关系	7	1150	13.09
父方亲属	28	3450	35.30
母方亲属	12	1770	18.11
朋友、同事	13	1210	12.38
师徒关系	4	550	5.63
邻居、同姓	30	1445	14.78
其他亲属	1	200	2.04
合计	95	9775	100

注：表格中除“姻亲关系”、“朋友、同事”之外的其他关系范畴均以户主 WWH 为基础。其中“姻亲关系”既包括 W 的妻子与弟媳的娘家人，还包括 W 的姐姐（收养）与妹夫；“朋友、同事”既包括 W 自身的朋友、同事，也包括其弟弟的朋友、同事。“父方亲属”主要指户主 W 的父系亲属，以及父亲的堂表兄弟，如姑父母、叔婶、伯父母及其子女（姑表亲、堂亲之类）、表叔表姑等；“母方亲属”主要指 W 的母系亲属，如舅父母、姨父母及其子女（舅表亲、姨表亲之类）。“其他亲属”指 W 已离婚的妹妹。

婚礼、生育礼、丧礼三种生命礼仪都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核心事件，生命礼仪的主体及其家庭为了庆祝、纪念而举办仪式，家庭人情关系网络内的人积极参与仪式并随礼，或者说，主家与宾客共同创造了一种仪式的场合，通过酬谢与随礼来完成仪式的意义。但是，很明显，三种生命礼仪的主体不同，人们随礼的指向主体也发生变化，也正是这种差异带来了三种仪式随礼的区别，以王家的三份礼单为例，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同仪式场合有不同的参与者。

由前文的礼单分析可以看出，王家的人情交往关系网络主要由姻亲关系、师徒关系、朋友、同事、同学关系、邻居、同姓等同村人关系、父方亲属、母方亲属等部分组成，但是具体到三种仪式场合，构成王家人情关系网络的各类关系在仪式随礼中的参与度也随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婚礼参与者中六成以上都是 W 妻子的“娘家人”，生育礼中也有四成以上宾客来自妻方姻亲关系；姻亲关系的随礼金额也居于各类亲属关系随礼的第一位。可以看出，在王家女儿的婚礼与生育礼上，以 W 妻子的娘家人为代表的姻亲关系参与最为广泛、随礼最多。然而，这部分姻亲关系并未全部参加 W 父亲的丧礼，究其原因，W 的妻子 C 认为，女儿婚礼与生育礼均在 W 和 C 组成的核心家庭内部举办，娘家人自然都会参与，而丧礼则是以 W 父亲、母亲为中心的“大家庭”范围内的仪式，所以娘家人不会全数参与。

“父方亲属”、“母方亲属”主要包括 W 父母亲的兄弟姐妹与表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多为长辈与亲缘关系较远的亲属，这部分亲属只在 W 父亲的丧礼上随礼，并没有参与 W 女儿的婚礼和生育礼。“父方亲属”、“母方亲属”是以 W 的父亲与母亲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参与丧礼主要是对 W 父亲生前及其家庭全部人情的回馈，所以说，丧礼随礼指向的主体是 W 的父亲，即死者，而不同于婚礼与生育礼中指向 W 的家庭及其女儿家庭。因此，指向不同主体的仪式，继而出现指向不同主体的随礼，这是研究不同仪式性场合随礼的一个重要维度。

综合三份仪式性场合的礼单来看，姻亲关系在婚礼与生育礼中参与最多，随礼最重；父母双方的亲属广泛参与丧礼场合；生育礼中少有邻居、同姓参与，而村庄潜在的伦理规则约束人们主动参与同村人的丧礼，但随礼较少；朋友关系是村民人情交往中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随礼金额也相当可观；同事、同学作为新的群体逐渐进入仪式性场合，但与其他几类关系相比，同事群体参与随礼相对微弱，调查中有村民认为“同事随的礼金

表4 N村四份婚礼礼单的综合分析

亲属与关系	随礼人数	随礼人数百分比	礼金金额	礼金百分比	礼金平均数
姻亲关系	45	23.44	47940	37.38	1065.3
父方亲属	40	20.83	31780	24.78	794.5
母方亲属	15	7.81	9640	7.51	642.7
朋友、同学关系	26	13.54	12880	10.04	495.4
同事关系	38	19.79	10980	8.56	288.9
邻居同姓	19	9.90	6140	4.79	323.2
过房亲	9	4.69	8900	6.94	988.9
合计	192	100	128260	100	668.0

注：本表格是对N村四户村民家庭的婚礼礼单的综合分析，分别是潘家（1999年儿子婚礼）、张家（2007年儿子婚礼）、金家（2008年儿子婚礼）、袁家（2009年儿子婚礼）四家的婚礼礼单。表格中的亲属、关系网络均以各户男性户主为中心。

应该返还”，这主要考虑到同事群体的不稳定性，村民的绝大部分同事来自于外省市，他们担心，如果当下接受同事的礼金，一旦同事离开工厂或离开上海，人情回赠便成为问题，因此，大部分村民选择不邀请同事参与仪式性场合。

黄玉琴最先提出“人情圈”的概念，用以指代当下“某一农民家庭有人情往来的家庭的总称”，并认为人情圈有相对固定的边界，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层次分布（黄玉琴，2002）。本文借用黄的“人情圈”这一概念，指代农民家庭的人情交往网络，而研究这一人情交往网络除了根据村民的口述资料梳理村民家庭亲属关系网络之外，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借助于礼单，呈现仪式性场合中有哪些人参与随礼，随多少礼。N村潘、张、金、袁4户村民家庭的婚礼礼单为我们分析村民家庭的人情交往网络提供了具体资料，以下表3-4是综合四份婚礼礼单制作而成的婚礼场合中各类亲属、关系的参与和随礼状况。

由表3-4我们可以看到，在潘、张、金、袁四家的婚礼上，姻亲关系在参与人数、随礼金额以及平均随礼金额三个方面都居于首位，参与人数最多，随礼总额最高，人均随礼金额超过1000元。在村民那里，“姻亲关系”并不被人们直接提到，通常由“娘家人”、“自家兄弟姐妹”等称呼来代替。可见，姻亲关系是N村婚礼场合极其重要的关系网络，在上述案例中，L的“娘家人”与L丈夫的姐姐共同构成了主要的姻亲关系，这部分人在婚礼上的随礼价值远高于血缘关系（L丈夫的兄弟）。在婚礼与生育礼上，姻亲关系参与最为广泛，随礼价值最高，这在N村是普遍现象，村民习以为常。在日常生活中，姻亲关系也成为主要的合作与互助对象，村民往往优先选择姻亲关系的姐夫、连襟、妻舅作为合作对象，而很少考虑自己同源的兄弟。问及原因，村民都不能具体回答，在他们看来，涉及到利益问题，与自家兄弟合作多有不便，而与姐夫、连襟、妻舅合作，压力则小很多。

三、简单的结论：

第一，姻亲关系成为亲缘关系中最突出的关系网络，尤其是在婚礼与生育礼上，姻亲参与者最多，随礼价值最高，而在姻亲内部，依据亲属距离和男女双方而区分的姻亲近亲与远亲、男方姻亲与女方姻亲随礼差异较大，以女方姻亲近亲随礼最多，比如，婚礼场合中“舅舅”往往要送出最大的礼。

第二，女性的地位在劳动和礼俗中得到确认，女性地位的提高源于家庭劳动生产方式的分工，礼俗是这种地位的一个集中体现。